

「商量舊學・涵養新知」 ——余英時先生的讀書與著述生活



二〇〇八年，余英時先生在史語所所長室

王汎森

中央研究院院士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古今論衡 第 37 期 2021.12

經常有人問我余英時老師的讀書與著述生活，關於這個問題，余先生曾經寫過一篇〈怎樣讀中國書〉，強調「讀書無定法」。此外，他在許多訪談中也多多少少提到一些讀書方面的經驗。在我個人與余先生頻繁接觸的六年間，並沒有機會仔細觀察他讀書寫作，甚至很少看到他抽出筆來。但是我試著將零星的觀察體會拼湊出來作為大家的參考。我必須強調，我只是余先生許許多多學生中的一個，所以我的觀察難免有所偏至。

我認為余先生與清代中期以來所流行的、從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入手的風氣雖然不同，但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他年青時代曾經把握機會，對古今書籍的目錄及大致內容有非常廣泛的掌握。有時講到某些書時，他往往還用手掌比出書的厚薄。加上他記憶力強，所以在下筆為文時，每每能引譬連類，很快想起一些可能相關的書籍（同時，余先生主張「唸歷史對現實要非常注意，每一個細節都注意」）。

我發現他對一九四〇年代以來現實政治、書籍、新文化運動人物有關的各種著作，掌握得非常仔細。

余先生治學強調「用力得當」，他曾經在一個地方說過，王國維集中用力於學問只有二十年，而成就如此輝煌，便是因為「用力得當」。此外，余先生讀書時似乎總是對帶有「總機」性質的文本反覆參詳、羅於胸中。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胡適、錢穆、楊聯陞的所有著作。以胡適為例，胡適全部的著作（包括遺稿）他都非常熟，而且他的大部分的著作中，每每多少會牽涉到一、兩條胡適的看法。以我觀察所及，像《胡適日記》便是他常年翻閱、熟極而流的書。余先生凡涉及近代政學的短文，往往都以《胡適日記》作為座標架之一，所以我稱之為「總機」——由總機通向相關時代的人物與事件。

我個人很少有機會直接觀察余先生讀書，不過在普林斯頓大學上課時，經常見他閱讀上課材料，其神情好像是時間在那片刻凝結，整個天底下只有他和那一本書或那一頁材料存在。這使我想起《朱子讀書法》中的一些名句。朱子說讀書時要「作焚舟計」、「作訣別計」，也就是說讀的那一刻要把它「吞」下去，好比上岸之後要把小舟焚棄，要永遠告別那個文本般。



余先生曾經告訴我，他到處讀，所寫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，備而不用的東西甚多。他經常是先讀衆書形成問題，再回去引證材料，做竭澤而漁的工作。

余先生讀書廣，記憶力好，好似他所讀過的書在腦海中都有精確的位置，它們組成一個廣大的「歷史網絡」。此後不管讀什麼新的書，或是人們關注什麼問題，這個特定的點應該在什麼位置、前後左右的關係是什麼，都能關聯搜尋。

記得二〇一七年，我重訪普大半年時，正醉心於 Milman Parry 關於荷馬史詩的理論，便與余先生談論。Milman Parry 在現代南斯拉夫找到許多與荷馬史詩相似的「格套」，因此對荷馬史詩帶來一個革命性的解釋。我因為知道余老師曾用心研讀希臘思想，且曾跟隨 Ronald Syme 讀過羅馬史，所以我想了解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。雖然余先生表示對這個理論不了解，但我感覺他迅速在啟動「類比網絡」來判定這個新說究竟應該放在什麼脈絡下理解。這種情形基本上出現在他對各種問題的談論中，尤其是當話題落到一九三〇、一九四〇年代以來的歷史問題時，這種感覺就更為鮮活。

余老師每天、每時都在思考，並試著形成初步看法，然後再慢慢修改，最後形成一個較為確定的看法。幾個月前，他開始閱讀某套近代歷史人物的日記。讀了前幾冊後，他便提到，從日記看來，當時有三群人國、共、自由派，而國共兩個陣營都在爭取第三群人，即廣泛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。國民黨陣營花的力量尤大，但共產黨方面比較成功。

余太師母（尤亞賢）曾經告訴我，余老師在哈佛讀書時，最喜歡觀看「梅森探案」，余先生也嗜讀偵探小說，甚至看過福爾摩斯全集。不論是梅森還是福爾摩斯，都如剝洋蔥般一層層直探案情核心，這也是余先生撰寫研究論文的特色之一。用朱子的話說「未見得道理時，似數重物包裹在裡許」，而一個有訓練的學者，便是要將一層層包裹解開，將「道理」開顯出來。

另外，我注意到余先生有許多文章其實命意很久，有的甚至長達二、三十年。他經常提到「腹稿」一詞；余先生日常總是微微皺著眉頭，我認為這種時候，他是在思考或打腹稿。也就是在下筆之前，他往往思考或打腹稿相當一段時間了，宛如海蚌在琢磨珍珠般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余先生在動筆寫文字前，往往要將重要資料讀一遍，然後空諸依傍，振筆而書，之後再回來核對材料。我猜，在這個過程中，他是循著「腹稿」中的脈絡要言不煩地寫下，而核心的證據適質適量的來到筆下，不會被摘抄史料的工作困住。據我所知，余先生一旦動筆，「日夜趕工」便是常態。譬如在耶魯時，爲了趕一九八二年七月間在夏威夷召開的「朱子學會議」的論文，他在當年六月卅日給楊聯陞先生的信上說：「日夜趕工，……幾不知人間尚有他事。」（06.30 信）

余先生相當重視新出材料，我印象中他長年訂閱《文物》，所以相當注意各種新出土材料。在《漢代貿易與擴張：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》、《東漢生死觀》等書中，新材料的點化作用便相當明顯。如果我的記憶沒錯，他對南越王墓中的一枚金印相當注意，認為有重要的歷史意義，但因為匆匆談過，所以未能道及其詳。

當然，余先生從年青時便非常重視西方的著作，並從中得到很大的精神滋養，所以想像力高遠，對話的對象也不拘限於中國。從他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，他在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（Felix Gilbert）、柯靈烏與章學誠的比較（Morton White）。^①甚至連《東漢生死觀》之所以計畫選擇「生」、「死」等一對對觀念作為歷史研究的單位，也是受了Crane Brinton的formal thought與popular thought之分別的影響。所以選擇以《太平經》等文本勾勒東漢一般民衆的生死觀。一九六七年，余先生在AAS所演講的論文即為“Interpretation of Formal and Popular Thought in Han China”。至於〈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〉一文受到Richard Hofstadter的*Anti-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*的影響，更是余先生在文章中指出過的。乃至於他後來在寫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邊緣化，及講打天下的「光棍」毛澤東的長文中，說毛澤東是五重的邊緣人。^②我推測這也與一九五〇年代盛行的Robert Park「邊緣人」理論有關。當然，余先生非常注意西方理論適用的範圍與分際，以韋伯的理論為例，他在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》中便指出具體將韋伯理論運用在中國歷史時的種種限制。

前面提到，余先生的著作每每有極長的醞釀過程，最初可能是幾滴水滴，後來則蔚為大潮。余先生著述生活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特色，便是「附庸蔚為大國」，而「附庸蔚為大國」其實是「積水成瀾」的一種表現型式。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四日，余先生告訴我，他所寫的文稿，許多創意皆在二、三十歲時。

譬如《漢代貿易與擴張：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》原先是一九五七年三月在楊聯陞課上的一篇報告，當時未即細寫。後來卻擴充成一本兩三百頁的書，這完全不在余先生的計畫中。只是在報告交出後，因為興趣而逐漸累積材料，愈積愈多，直至將它發展成書，此期間為了閱讀俄國考古材料，還曾經僱人將Rudenko的著作譯成英文（我做學生時還曾在課堂上聽余先生講到Rudenko的工作）。又如《紅樓夢的兩個世界》，據張灝先生告訴我，原是余先生學生時代在「打漁莊」讀書會中報告的題目，一直到一九七三年才開始著手寫成文章發表。這篇及其他有關紅學文字相當引人注目，余老師曾告訴我，大陸學界最初以為他是紅學家。

① 余先生告訴我，他一九五五年在美即買柯靈烏的書，當時柯靈烏並非如此流行，最流行的仍是Hempel一路，主張「通則」的方法論。

② 「毛澤東可以說是集各種『邊緣』之大成的一個人：他出身於農村，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；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，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；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、舊小說，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邊緣；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，但又沾到了『共產國際』的邊緣……。歷史的狡詐把他送回了邊緣人的世界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。」余英時，〈打天下的光棍——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〉，收入《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4），頁51。

《論戴震與章學誠》也是附庸蔚為大國，原先是為 Nivison 的英文書所寫的書評，這個書評乃楊聯陞所薦，而余先生認為早年在錢穆處常常與聞有關議論，故有所準備。但余先生始終認為章氏思想非常深奧，民國以來，人們了解章氏每每借途於梁啟超和胡適。梁、胡二人的貢獻確實大，但是對章氏思想深層的了解尚不夠深入，^③所以他深入研探，最後竟寫成一本書。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則是將他多年的零星意見彙集藉機表達出來。在一份文件中，我發現余先生在密西根大學任教時，還申請過一個題為“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Class”（中國知識階層的歷史）的計畫，準備研究先秦「士」的起源及發展，^④而這個計畫顯然是後來《中國知識階層史論：古代篇》中相關各文的濫觴。

又如〈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〉一文，雖然發表於一九八六年，但事實上早在一九六一年便已開始著手。《楊聯陞日記》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：「四時許余英時來，出示講稿（循吏）」，並提到漢代循吏重視「條教」的問題。即如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》一書的發端，恐怕也與《漢代貿易與擴張：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》有關，甚至可提及更早，一九五三年他在《自由陣線》上發表的〈重重壓迫下的中國商賈——中國傳統社會人物批判〉。

除了上述之外，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》、《重尋胡適歷程：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》、《未盡的才情：從《日記》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》，乃至千頁的大書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也都是由一篇「序」而發展出來的。我個人認為「附庸蔚為大國」，也是前面所提到的長久醞釀的一種表現方式：余先生每每在腦海中存放著若干問題，平常持續地關注、思考、積累，到了適當的時候，便以這些積累作為基礎跟進一步研究，形成系統的論述。

接著我要以余先生最後一部學術著作《論天人之際：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》為例說明上述那種長期切磋琢磨的過程。

余先生在撰寫《論天人之際》時，曾一再告訴我這是他的最後一本書。他說，其實這個問題「從禮樂講起」，在一九七〇年代即已著手（應該是余先生為《中國上古史待定稿》寫〈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〉時，便已觸及這個主題）。在零星的談話中，他提到過去講軸心突破，大多是描述性的，未能證實如何變遷的過程。他則想講「思想世界從原始宗教來，發展出一個思想精神傳統」的過程。想看「禮樂如何轉出諸子」，他說：「儒帶有巫的色彩，先秦諸子與巫鬥，密以『心』代替『巫』，『心』溝通兩個世界。」他說：「諸子學出於王官論，如果相干，也要重新整理。」他說清儒無法碰觸這個問題，章學誠略為及之，但仍未碰上。

③ 後來此書出版後，楊聯陞曾去信表示，戴、章二人皆未有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且無宇宙論。

④ 1964.04.09：「今年已向校方請求一筆研究經費，題為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Class，準備於三、四年內寫成一書，討論自春秋戰國至兩漢間士階層之興起與發展。」

余先生告訴我，在寫作的過程中「條條大路要打通，牽涉到東西太多，不完整，靠新材料」、「構思很早，但不知如何下手」、「非常艱難的工作，有些部分寫了好多次」。在形成他的論述時，隨時留心出土文物。但他強調《郭店楚簡》一般將它講得太早，認為是在孔孟之間，但余先生認為是孟子以後的東西。余先生告訴我，為了研究這個問題，他把《柏拉圖全集》又讀了一遍。他強調：「亞洲許多宗教是知識分子起來對原有的宗教進行改造。」

我注意到余先生每每完成一篇論文之後，會影印若干份送請師友批評，然後在這些回饋的基礎上進行修改。尤其是他的老師楊聯陞，每每在讀完之後「從四面八方來攻」（余先生語）。在《楊聯陞日記》中便存在一些這類論學語。

當然，我也注意到余先生有一些未竟之業。在密西根大學時期，余先生除了撰寫《漢代貿易與擴張：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》之外，另一個工作是將博士論文《東漢生死觀》整理出版，他先是整理出兩個長篇在《哈佛亞洲學報》分兩期刊出，同時也計畫將之發展成一本兩百頁左右的書。但這個計畫似乎遇到困難，最大的困難是余先生不想重複在舊題目上工作。在我看到的材料中，余先生構思這一本書撰寫導論「漢代思想與生活」，由於他認為《太平經》反映了漢代平民思想，所以計畫選譯其中若干篇章，加上導論附在書後。此外，他也計劃將桓譚的「形神」論譯成英文，同樣附在書後。^⑤但是余先生後來似乎沒有完成這個出版計劃。

以上是我對於先生的讀書、著述所作的一些歸納整理，希望對世人了解余先生增添一點幫助。朱子的「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涵養轉深沉」，是余先生經常提到的，也很適合用來描寫余先生的讀書、著述生活。



^⑤ 余先生擬寫一導論「漢代生活與思想」，附錄加「漢《太平經》論漢代平民思想」一文，作為《太平經》選譯之引論。此外又擬附入桓譚的「形神」一文之譯論，全書印成希望在二百頁左右。《楊聯陞日記》，1964.04.09條。